

歷史的回顧

——台灣問題：1949-2008

王今翔*

筆者曾接觸台灣問題有年。工作學習之中，體會中央方針，溫習歷史經驗，偶有所得，或信手為記。近來翻閱舊篇，環顧時事，似仍可鑒往而知今。遂摭取其要，連綴成文。時近新歲，2009年值得紀念者正多。謹以此文，紀念60年前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關於台灣問題的歷史性談話，紀念其後風雲變幻的台海歲月；同時紀念30年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紀念因之開啓了兩岸關係的新時代。

1949年初，在全國勝利的前夜，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揚，就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黨的意見。在談及當時戰爭形勢時，他指出，“比較麻煩的有兩處，台灣和西藏。”“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退到那裏去，以後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保護之下，台灣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他還說，“海島上的事比較複雜，需要採取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比較多的時間。”¹雖然，此後中央亦曾計劃於1950年下半年解放台灣，但終因朝鮮戰起，美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站住了腳，從而使中國分裂至今。60年後，當我們回首台海局勢演變的時候，仍為毛澤東那洞穿歷史的眼光而心懷景仰。

一

終蔣介石一生，依美反共立場未曾稍變。但同時，他又始終對美高度警惕，避免了李承晚、吳庭艷等同類人物的下場。他始終堅持“中華民國”法統不變，主權及於全大陸；同時，不放棄金馬，以保持同大陸

的接觸，即使這種接觸是刀兵相向(1958年炮戰)。這一政策是出於蔣氏極度反共、仇視人民的立場——視大陸的進步變革如無物——以及個人獨裁的權力慾。但蔣氏這一政策又使美國以及當時的聯合國不能在理論上(國際法理上)使台灣同大陸分離。大陸人民視蔣為匪，蔣視大陸為匪。極度的對立，卻又走到了一起：只有一個政權能代表中國。這使企圖徹底、永久分裂中國的外人徒呼奈何。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宣稱“台灣地位未定”，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以後，美台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台為美國遠東戰略第一線。但蔣介石的大中國意識與極端獨裁的權力慾使他同時又為美國所嫌憎。美國始終沒有放棄以更親美的政治勢力取而代之的企圖。台灣被美國“拿過去”的危險現實地存在着。蔣介石集團雖然頑固地反共反人民，但它的心腹之患卻並非中共，而是美國。稍一不慎，就可能被美國置於死地。這種矛盾也是現實地存在着。正是基於對這種形勢的清醒認識，中央確定利用美蔣矛盾，支持蔣對美鬧獨立性、抗拒完全被控制的命運，以防美以更聽命的傀儡取代蔣而徹底使台灣分裂出去，並對蔣方開展工作以期將來國民黨當局能“率台灣整個來歸”。

毛澤東1956年會見台方朋友時說：“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曹聚仁女兒回憶)。曹聚仁在《北行小語》中評論稱：“毛氏是懂辯證法的。在黨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又一重大的轉變呢！”這種“轉變”，就是出於民族利益，在美國企圖永久霸佔台灣、分裂中國的威脅面前，我黨再次主動調整策略，使國共鬥爭讓位於民族矛盾。為此，我方對蔣集團作了重大讓步，即不反對它在島內的統治，而視之如為

* 前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我民族暫守金甌一片，以爭取該集團與我方配合對美，並爭取未來的合作與統一。

1958年，毛澤東指揮的炮擊金門之戰，即是這一政策、策略的集中體現。當時，美國向蔣施壓，要其撤守金馬，以圖實現劃峽而治，為蔣所拒。美之陰謀及與蔣集團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為我方洞悉。於是而有炮擊金門。固然，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出於廣泛的國際視野，是在當時國際形勢下的戰略動作。但直接目的則為助蔣抗美，使蔣不撤守金馬，挫敗美以金馬換台灣、隔斷台與大陸聯繫的陰謀。毛澤東為炮擊金門確定的戰略意圖是“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名為對蔣、實為對美”。戰前毛澤東即經曹聚仁轉告台蔣我方將炮擊金門，以取得戰略上的配合。10月5日，周恩來總理會見曹聚仁，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我們根本不同他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毛澤東也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保住金門、馬祖的方針。如蔣介石撤退金門、馬祖，大勢一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到一起，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金馬部隊不要起義。”這裏所體現的思想非常明確：支持蔣不垮，支持他抗美。所謂“很可能垮”，是擔心蔣垮，代之者肯定更親美，很可能與美“搞到一起”，則台灣前途堪虞，勢必落入託管、台獨的圈套。

那個時代，美第七艦隊在台海巡弋，《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保護台不受我方攻擊。蔣介石當局當時仍舊得到國際社會多數的承認。如台灣獨立或接受託管，則可在國際上造成既成事實。雖然歷史終究會糾正，但畢竟將是一大曲折。然而蔣氏始終拒絕這一選擇，成功地頂住了美國的壓力，使台未落入更親美的人物之手。蔣氏的政策，其出發點當然是反共反人民的，但是他在困境中堅守民族觀念，對內厲禁台獨，國際上“漢賊不兩立”，客觀上與我方有相通之處。當然，同樣重要的是我黨的戰略、策略調整，不再反對國民黨在島內的統治，支持蔣對美鬧獨立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客觀上的雙方配合。這種正確的政策與雙方的配合，得以保住台未獨立，未被託管。蔣集團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是我方實行聯蔣反美政策的客觀前提。毛澤東主席親自制訂的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在其後歲月中，長時間地成為我方對台鬥爭的基本方針。

二

1975年，蔣介石病死台灣，蔣經國順利接班。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更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把“和平統一祖國”提上了議事日程。1979年元旦，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福建前線我軍停止炮擊金門。海峽兩岸長期緊張對峙的狀態由於我方的主動而驟然趨於緩和。此後，“葉九條”、“鄧六條”，直至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向全體中國人、向全世界表明我黨民族利益至上的寬廣胸襟和解決台灣問題的真誠願望。輿論、人心明顯有利於我方。而蔣經國為首的台灣當局，在世局大變，外交陣地逐一喪失，對手策略高明的情勢下，錯愕之餘，僅能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應付，顯得十分自私、頑固與無力。而此時，大陸的改革開放逐步展開，成就斐然。相比之下，台灣的“萬年國會”、戡亂戒嚴體制，使它在國際上愈發被動。

當時，台灣島內的政治局勢也在急速變化之中。長期以來，美國固然一方面支持蔣氏國民黨以反共拒統，另一方面又深深不滿蔣家的極度獨裁、抵禦美國的完全控制而使之不能遂其永久分裂中國之願。美先曾企圖換馬代蔣未果，後不得已而長期培植、孵化“黨外”勢力以待來日。蔣介石死後，小蔣固然順利接班，但二世之主，終不能有老蔣的威勢。島內親美、要求民主的“黨外”勢力迅速發展。而這個勢力的民主訴求卻又與台獨主張糾纏在一起，其背後正是美國的支持。這股力量來勢之兇猛，已使國民黨的統治受到極大威脅。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後的“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已可明顯見其力量之大，幾乎“動搖國本”。如無善策消弭隱患，在美國的支持下，這個力量終將置蔣家王朝於死地。在這種內憂外患空前的形勢下，國民黨再繼續老蔣的政策，既要美國支持反共，又厲禁台獨、拒絕美國要求的“民主”，似乎已力不從心了。蔣經國集團的確面臨着一個危難的時刻，台灣也面臨着極其不確定的兩種前途。亦即，蔣經國身後將無可避免地為美國所扶植的更親美的勢力取代，台灣形勢更趨複雜，謀求統一更難。同時，蔣經國集團出於自身利益，如不甘為台獨、更親美勢力取代，則也可能轉向我方，從而出現有利於統一的形勢，開始統一的進程。當時島內一方面是美（經過其支持的台獨）蔣矛盾，美國更接近了它的目標：取蔣而代之；一方面是國共矛盾，蔣經國集團對我方和平統一的真誠呼籲疑懼仍深。我方看到這種形勢變化的趨勢和這兩個矛盾對蔣的影響，以高度的緊迫感開展對蔣的工作，以爭取第二種前途。鄧小平明確提出“力爭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解決問題”。除了

“一國兩制”這一宏觀構想，還表示“甚麼都可以談”，“只要談起來，沒有甚麼不可以解決的”，“如能在經國先生手裏實現統一，蔣家的歷史可以寫得好一點”，甚至表示“國號國旗都可以商量”。當然也明確表示，“首都只能在北京”，“外交屬中央”，“只能高度自治不能完全自治”。所有這些，是在當時特定形勢下，在“一國兩制”構想之下，嘗試以大讓步，求得統一的大進展。即以盡可能的讓步解除蔣氏的疑忌，引導蔣氏集團做出有利於統一也有利於自身的選擇。這是我方基於民族利益而在新形勢下實行聯蔣反美、勸蔣拒美的又一次集中努力。如蔣氏生前能夠採取實際步驟與我方和談，本可以實現初步統一，至少可以奠定統一的方向。這種局面一經國民黨政府引為既定政策，則其後人亦不易更張，如此即可形成一種“最大的制約”，在蔣身後能夠壓制台獨勢力而向統一方向邁進。

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蔣經國始終未曾採取任何措施以推動和平統一。在他身後，形勢更加複雜，甚至倒退。究竟這是甚麼原因？是否如某些論者所言，假如蔣能多活幾年，形勢可能好得多？果如此，則歷史的發展似乎過於依賴偶然的因素。實事求是地分析蔣經國晚年的政策，可以明瞭兩岸關係何以會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蔣經國晚年最重要的兩項政策，一是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二是開放黨禁報禁，開始民主化進程。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數十萬部隊隨老蔣亡命台灣，與家人隔絕 30 多年，這是慘絕人寰的悲劇。1979 年我方《告台灣同胞書》之後，蔣經國的“三不”政策顯得十分不近人情，面臨巨大的壓力。島內開始的解嚴、停止戡亂時期，使政治生活日趨活躍。老兵返鄉的願望逐步形成輿論，使蔣再難回避。尤為甚者，民進黨也在這個問題上打主意，企圖挖國民黨牆角。面對這種威脅，蔣決定開放老兵探親。分析其出發點，此舉乃代父還債並維持基本群眾的支持並贏得了兩岸的一致贊許，使台當局在兩岸關係上長期被動的處境大為改觀。但是蔣氏是否有意以此為發軔而準備開始統一的進程？歷史的發展又為甚麼使我們嗣後不得不面對一個日益複雜的局面？

在開放探親之前，蔣經國決定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報禁，開始了民主化進程。（但民進黨是在正式開放黨禁前夕成立的，亦在開放探親前而為國民黨所默認）。此舉，使台灣開始了政黨政治，對台灣政局發展具有長遠影響的變革，由此台灣內部政治力量的矛盾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反對力量終於可望以合法的形

式發展，從而解除了因反對力量聚集、矛盾激化危及政治穩定並為大陸所乘的危險，這是一個企圖使“中華民國”長治久安的部署。當時，由於島內形勢的變化和外部的壓力，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面臨日益嚴重的挑戰。蔣氏的政治革新，一部分是出於這種社會背景，可謂明智的選擇。但是觀察島內各種政治勢力在這種開放中的相互關係的變化以及它們對美國、對我方的態度，則可以赫然發現，其政治革新，同時使長期非法的以台獨為最終目標的政治勢力合法化，民進黨從而成為可與國民黨相抗衡的第二大黨。從此之後，長期被嚴厲禁止、被鎮壓的台獨主張，可以公開宣傳；台獨人物可以堂而皇之地活動，並可以最終參政。

這是蔣經國最終做出的歷史選擇。在兩岸關係、島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之際，以小蔣國民黨之力，再奉行既依美反共拒統又防美厲禁台獨的政策已力不從心。或者接受中共的倡議，以實際行動開始統一的進程，依靠大陸支持，制約台獨，解除其威脅以維持穩定；或者屈服於美國壓力，向台獨讓步，也可以避免變生肘腋。歷史證明是蔣經國選擇了後者。解嚴與開放兩禁的實質是，國民黨長期依美反共但亦防美反台獨的政策轉變為依美容獨反共拒統的政策。小蔣的目的是憑此政改消弭內憂而使“中華民國”在台長治久安。為此，亦不得不向台獨讓步，向美國讓步。蔣氏憑此基本上調整了與美國的矛盾，美因而改變了對台內政長期持批評的態度，轉而稱讚其“民主”。這是因為台灣內部政治演變終於走上了更有利於美國戰略利益的方向。美國長期經營、謀求的目標終於實現了：蔣記國民黨已不可能以單方的行動將台灣“出賣”給中共而突然改變遠東的戰略格局。國民黨政權的處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此之前，威脅國民黨政權的表面上是我大陸一方，而實際上是美國支持的反蔣台獨力量，後者是具有現實危險的心腹之患。所謂“季孫氏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政改之後，台獨勢力可望經合法道路走上政壇，放棄了“體制外”奪權的手段，另一方面危及國民黨自命“中央”地位的，只餘我方“一國兩制”的主張了。蔣經國自以為，從此可以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而全力與我方周旋了。蔣氏晚年的政改反映在兩岸關係上，實即標誌着蔣已最終決心拒絕我方的和談呼籲。我方以大讓步求統一大進展，以兩黨對等談判實現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可能，已經歷史性地消失了。

對於蔣經國晚年何以決心開放探親與開放黨禁報禁，一向言人人殊。經過這麼些年月之後，根據由此而導致的後果，似乎可以認定：開放老兵探親，是一

種歷史的還願；而開放黨禁報禁，則是前瞻的部署。他以對大陸最後的眷念，開放老兵探親，向歷史交待兼且向大陸交待，表明他在感情上與大陸血脈相連。他以最後的決心，開放黨禁報禁，向台灣人民兼且向美國表明，希望在他身後“中華民國”不被中共吞併。在他身後，只要保住“中華民國”，哪怕它已不是蔣家、不是大陸人作主，甚至是民進黨作主，亦在所不惜！

三

我方與蔣氏父子幾十年的鬥爭歷史證明，他們根本上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罔顧民族大義的反動集團。蔣經國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仍拒絕我方以兩黨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的呼籲，做出有利於美國、有利於台獨的選擇，不是偶然的，而是這個集團本性的歷史必然。蔣介石國民黨集團是依靠帝國主義支持而起家的，它的全部歷史，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這個集團逃台之後，依然本性不改。蔣介石雖然對我方的支持心中有數，但也僅僅以此作為借用的力量，作為用以“向美國人講話的資本”，而對我方的和談統一呼籲敷衍到底。1972年，曹聚仁致信費彝民稱“老先生堅持不作李後主”，實即與大陸為敵，至死不改。蔣經國末年，明知在其最後的日子裏，或則與中共聯手抗衡美國、台獨而為台灣開一光明前途，或則向美國、台獨讓步而使台灣長久地與祖國分離。而他居然選擇了後者！這是近現代史上反動集團的通病，“寧予友邦，不予家奴”。在民族大義與小集團私利之間，他們是捨前而取後的。

台灣問題之有今日，歸根結底還是美國長期經營的結果。固然，上世紀70年代，因當時的世界戰略格局，中美雙方各有所需而開始了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並導致國際社會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自1971年我方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上一個中國的合法代表權已為我方所有，台灣獨立已不可能得到國際法的支持。因為我方的主動，兩岸關係已有巨大緩和和多方發展，是為我黨工作重心轉移所致，是為我方大局所需。不僅為了促進統一，首先有利於改革和建設。我們已經實現了預期的戰略目的。而我強台弱，我主動、台被動的大局也是不會變的。但同時又必須看到，幾乎與此同步的是，美國人也得到了他們想得到的：台灣已出現了一個本土化的、徹底親美的政權，美台關係之緊密，為前所未有的。過去存在於美台之間的齟齬

與矛盾，在蔣經國末年、李登輝執政後基本上歸於解決。台當局在島內陸續完成的政改是美國長期影響的結果，也滿足了人民的民主訴求。統治集團與人民的矛盾呈現一種可以調節的狀況。島內各主要政治勢力形成了一種分以爭權、合以拒我的關係。而朝、野兩黨對人民的影響仍大於我黨。事實上島內反共拒統的形勢更穩固了。這表明我方在國際範圍確立正統的法理地位的同時，美國在島內的優勢反而得以鞏固。這種各自佔有一方優勢的狀況將長期決定着兩岸關係和祖國統一的進程。

回顧新民主主義革命，我黨走過了一條通過長期的鬥爭喚起群眾團結群眾從而取得勝利的艱苦卓絕的道路。當1949年全國勝利在望的時候，我黨的綱領，不僅得到解放區人民的擁護，也得到國統區人民的擁護。我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成為真正無敵的力量。因而毛澤東才能滿懷豪情地斷言：“中國人民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經過30年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其中22年是最高形式的武裝鬥爭，中國人民在我黨的領導下，覺悟水平和組織水平都已達到成熟的程度，足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帝國主義列強面前站立起來。這便是當年勝利的根本。

作為民族民主革命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先後得以解決，港澳回歸祖國。但其性質與1949年的勝利有極大不同。港澳回歸，是在國際條件成熟而當地群眾條件並不完全成熟的情況下自上而下實現的。因我方之力量與國際地位也因港澳的地理位置，無論英、葡，均無力阻撓我方按“一國兩制”的方式對兩地恢復行使主權。但港澳當時的社會條件則遠不能與1949年時經過長期深刻革命洗禮的內地社會條件相比擬。兩地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還不完全勝任擔負回歸以後的歷史任務。回歸以來，兩地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困難，歸根結蒂均源於此。而我們面臨的任務，實質上是在補群眾工作這一課（此處“群眾”，包括社會各個階層）。無論政權建設、發展經濟、社團工作，還是防範敵對勢力、維護社會穩定，均可歸結為提高群眾的覺悟與組織水平，以期適應由中國人掌握政權以負起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這一歷史責任。

“一國兩制”的構想，本起於台灣問題，卻先在港澳問題上初見成效。但如前所述，台灣內部社會矛盾發生重大變化，標誌着統一將不能再循港澳的模式，而需重走大陸勝利的道路。當然此說非指需經武

裝鬥爭，而是必須等待島內群眾條件的成熟。在此之前，再不能指望經與台灣當局的交涉而推進統一的進程。從今而後，只有依靠台灣人民的覺悟，依靠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團結，而最終實現再造統一的民族夙願了。我們過去爭取的自上而下的統一，將轉變為自下而上的統一。即當我方已具備統一條件並經深入工作，島內人民起而要求統一並漸成潮流。執政集團或者順從人民的意志，接受我方條件實現統一，或者被人民拋棄，而以另一個集團取而代之。實質上，這將是一場最終擺脫外人附庸地位的愛國民族解放運動。由於島內的社會環境，這一運動將表現為民主的形式。當然它的實現，需要適宜的國際形勢和大陸的配合與保障。

四

蔣經國晚年的接班佈局並非由李登輝一人獨攬，而是以他與蔣系舊臣集體掌權。但既然蔣在政治上已向美及台獨勢力讓步，則蔣家“大勢已去”，其身後權力格局自然只能按照美國與本土勢力的意願演變。李挾美空前的支持、台灣民眾的期望，以一介書生而迅速排斥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宋楚瑜稍後)等人，大權獨攬，真可謂形勢比人強。這實際是蔣交班佈局的邏輯演進。而李的內政、外交、大陸政策，亦為蔣氏晚年政策的邏輯發展。不同的是，李的行為，更具有感情色彩。不但是反共的，而且有清算國民黨的味道，不僅如此，還要清算與歷史、與大陸相關聯的一切，而使台灣看上去成爲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地方。江澤民曾論及日本在台灣強制實行“皇民化”教育的影響時指出，李登輝的病根即在於此。當他的地位逐漸鞏固以後，台獨傾向日益明顯。過去，對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對中學母校的談話，諂事日美，詛咒大陸。種種妄言，但凡受過傳統儒家教育而懂得華夷大防的人，絕難出口。直至1998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兩岸關係跌入谷底。

2000年陳水扁得以當選，並非因民進黨已具備了勝利的條件，而實出於李登輝之私授。李與國民黨的淵源，遠不及他心中對國民黨的怨懟。因而，必欲以民進黨接班，是為邏輯中事。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傳統勢力暮氣已深，積重難返。關鍵時刻，派系紛爭，私利至上，毫無大局觀念可言，因而無法抗衡李瓦解國民黨的圖謀。而李氏之經歷與心理又與台灣人民有相通之處。內外呼應，國民黨終至下野。這一結果，

從國民黨自身尋找原因，與其在大陸的失敗如出一撤。非敗於民進黨，實敗於自己。如分析其社會原因，則可看作台灣人民對其長期統治的歷史積怨的清算。李登輝、陳水扁雖分屬兩黨，但政策一脈相承。李、陳的省籍背景，使他們與人民感情上易於相通，對人民影響較大。李、陳執政20年間，島內形勢與兩岸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利用省籍恩怨，清算歷史舊賬，以打擊弱化國民黨。而國民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則始終被動，究其故，應是歷史上欠債甚多，心存恐懼。面對民進黨的種種打擊，無力確定相宜的政策以爭取民心，取得主動，反而左支右絀，刻意表白自己的“本土化”立場，有時甚至不禁向台獨示好，以致在此期間，台獨氣焰日漸囂張，兩岸關係充滿乖戾之氣。

陳水扁第一任期內，政績已是乏善可陳，經濟下滑，社會動盪，腐敗濫權之速，幾乎較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民心漸去。2004年大選，國民黨本已成必勝之勢，卻因“3·19”事件失於一旦。此事為陰謀殆無疑義，足見陳水扁膽大妄為，確非易與之輩。而國民黨應對失據，亦非一時之失。因一偶發事件而導致形勢逆轉，正是國民黨仍未走出整體弱化的過程而產生的必然結果。

陳水扁上台之初，出於自己需要而承諾的“四不一沒有”，很快即被拋諸腦後。陳全面重拾李之舊政，並以更激進、更張揚的方式將其推到極致。陳出於本質，亦出於私心，實行與大陸全面對抗的政策。他反覆重申主權獨立，終止“國統綱領”，煽動烽火外交，揚言外島決戰，直至策劃“制憲”、“入聯公投”，使兩岸關係滑至1979年以來空前緊張、危險的境地。

五

我方對蔣經國身後島內局勢的演變，有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初期，我方仍實行爭取經政治談判促統一的方針。以李登輝為對手，重視他，爭取他。當然，亦有鬥爭，但側重於爭取。直至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我方之努力終告落空。以此為轉折，形勢日見複雜，甚至數度緊張。陳水扁當選，局勢更形惡化。使我方只能以全部的工作極力規避“急獨”的危險。中央實行了正確的有團結有鬥爭的策略。以胡錦濤主席在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為指針，更加深入務實地開展了對台灣人民的工作，先後開通兩岸節假日包機，為台灣農民在大陸銷售產品、學生在大

陸就學、專業人士在大陸執業提供方便與優惠，充分體現了對台灣人民的關懷。同時，以嚴厲的態度反制陳水扁“急獨”的挑釁，通過頒佈《反分裂國家法》，展示不惜一戰以制止台獨冒險的決心。由於我方正確的政策策略與工作，也由於陳氏之政策有出於私心的成分，事實上也脫離了實際，違背了台灣人民的利益，使台灣人民惟恐因之而受池魚之殃，從而對陳漸生疑慮，漸次疏離。在對“急獨”挑釁進行堅決鬥爭的同時，我們也調整了此前的某些政策策略，也有妥協。我們放棄了一個時期中急切推進政治談判的努力——當然，此亦因“兩國論”而無從談起，不再批判“中華民國在台灣”，甚至暫時淡化了對“一國兩制”的宣傳。亦即由積極謀求兩岸關係政治上的進展、推進統一進程轉為力爭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維持穩定，維持和平。由此，國民黨得以擺脫兩面受壓的窘境，得到了回旋的空間，逐步找到了適宜的角度，開始走出被動。它明顯地與民進黨拉開了距離，正面批評其冒險的大陸政策，呼籲為台灣的安全、安定和經濟發展而改善兩岸關係，並終於邁出了連戰大陸之行的歷史性一步。連戰在大陸期間，兩黨達成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為兩岸關係規劃了健康發展的方向。連還以委婉地為台灣說項的姿態，尋求我方之理解與配合，並爭取島內民意支持。

這是兩岸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連戰的“破冰之旅”標誌着國民黨謹慎地邁出了聯我圖存的一步，首次真正形成了雙方的合作。國民黨借此得以重返政權，我方則借此得以避開了民進黨“急獨”挑釁造成的危險。當年，我方對蔣氏父子的的工作，即是基於美蔣矛盾而爭取其依我圖存走和談統一之路，但終未實現。因為國民黨始終仰美國鼻息而不能改，小蔣末期還要看台獨的臉色。如此含詬忍辱，以期求得台人的寬宥而維持舊局，處境卻日見艱難，並最終下野。假使國民黨當權時能邁出這一步，不止兩岸關係不致有後來的麻煩，國民黨自身亦不致落得如許地步。連戰對胡主席講“相見恨晚”時，心中當有此感慨。此時，國民黨雖已下野，但畢竟仍是重要力量。它能邁出這一步，與我方配合，抵制陳水扁的“急獨”路線，尋求民意支持，有利於改善自身處境，也有利於改善兩岸關係。正是以此為轉機，在隨後的“立法院”選舉、縣市長選舉，直至2008年“總統”選舉中，國民黨一路獲勝。在下野8年，蔣經國去世20年之後，國民黨終於重新執政。馬英九的兩岸關係政策，表現出明智務實的傾向。馬當選之後，迅速實現了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訪問大陸，海協海基兩會恢復商

談，兩岸關係可望進入一個新的比較健康的發展階段。

李登輝、陳水扁當政期間，兩岸關係起伏動盪，海外華僑社會亦隨之情緒波動，幾致整個中華民族因台灣問題而擾攘不已，有時甚至陷入某種亢奮。這種狀態，有可能嚴重危及我方中心任務，對華僑的處境無益，對中華民族的和諧發展無益。由於中央有團結有鬥爭有妥協的正確方針、策略，由於多方的工作，至此，民進黨煽動的“急獨”逆流終於得到遏制。兩岸關係經過激烈震盪、擺動之後，重歸平穩。因形勢緊張使我方不得已而採取某種斷然措施但又因島內群眾條件不成熟而使形勢更加複雜化的危險得以化解。我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大局從而不致因台灣問題受到嚴重干擾。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階段性的形勢轉變。

六

當然，這一形勢並非因島內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所致。蔣經國末年形成的島內政治格局及由此導致的兩岸關係大局依然如故。激進的台獨企圖不可能得逞。試圖在統一方向上取得重大進展一時亦難如願。維持現狀是島內民意主流，也是兩岸目前的政治共識（島內以執政黨為主導）。而這一共識又以擱置政治爭議為前提。甚至對於現狀的解釋都各自不同，遑論對前途的期待。

台灣問題的性質、我黨我軍的性質，決定無論最終以何種方式實現祖國統一，都必須取得台灣人民的支持。今後的一切工作，可歸結為團結台灣人民，期待他們的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而造成統一形勢。但是，由於近現代史上台灣的特殊經歷，使得這一工作較之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在大陸的工作具有更為複雜的性質。

晚清時期的中日甲午之戰，清廷因戰敗被迫割讓台灣。無論台灣紳民如何泣血陳情、誓死效忠，都不能感動朝廷於萬一而被無情拋棄。台灣人民的浴血抵抗終於失敗而遭日人屠戮、奴役50年之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全島百姓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但迎來的居然是“2·28”事變，是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血腥鎮壓。此後更是長期的軍法統治、白色恐怖。是則歷史上，台人無負中央，中央兩負台人。近百年“二等國民”的命運，屈辱、悲憤、怨望，成為台灣人民“對歷史的集體記憶”。1949年之後，台灣再次與大陸長期分裂，我黨與台灣人民的聯繫被割

斷。國民黨出以私心對歷史和現實的曲解以及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前進道路上遭遇的困難與挫折，使得台灣人民對大陸的實際、對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又有不少誤解，隔膜甚深。這一十分特殊的歷史經歷，決定了台灣人民在思索、尋找前途時，自然容易轉而求諸自己。人民的正當要求與外人支持的台獨訴求糾纏在一起而終於造成今天複雜的形勢。

對此，我黨並無責任。這是歷史上的反動政權，尤其是國民黨造成的惡果。但是，我黨領導的政權既已負起全國的責任，繼承了全國的主權，便也不得不繼承舊政權的孽債。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我們長時期內的困難，時至今日，仍然是如何化解台灣人民對大陸的疏離心態，對大陸的中央政權的不信任。

台灣問題之複雜，還因自 1949 年台灣與大陸再次分裂以來，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與 1949 年之前的中國已有重大區別。國民黨逃台之後實行的經濟社會政策，從陳誠主持的土改起，到蔣經國末年開始而在李登輝任內完成的政改，使台灣最終實現了民主變革。這意味着由內戰到民族民主革命所遺留之問題，已部分得以解決。台灣人民終於從軍法統治和白色恐怖下解脫出來。我們因這種變革而為台灣人民慶幸。他們曾為此進行了長期的鬥爭。這一民主變革改善了人民的生存狀態，滿足了人民的要求。它調節了台灣各階級的關係，調節了台灣省籍同胞與國民黨當局的关系，從而使台灣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但是，同時又須清醒地看到，這一變革同大陸於 1949 年取得勝利的、我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自下而上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有極大的不同。台灣的民主變革是在美國的影響干預下，由親美上層資產階級主導，自上而下實現的。它以維持鞏固與大陸的分裂為目的。因而對台獨的妥協是其鮮明的特徵。這種社會變革帶給兩岸關係和祖國統一進程的影響，是使形勢更加複雜。明瞭台灣社會這兩個特殊的歷史進程，便可以解釋何以多年來，儘管島內政客紛爭活劇不斷，社會動盪時起時伏，有時甚至劍拔弩張（如施明德紅衫軍之圍“總統府”），我方卻始終無從措手而引領局勢向統一方向靠近。

最終轉變這種局面，而使統一成為島內民意的主流，只能依靠台灣人民的覺悟。這是一場與台灣當局

爭奪民心的鬥爭。我們要代前朝償還歷史舊債，撫平深受傷害的台灣民心，我們要從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將台灣人民與當局區別開來而贏得他們的支持。所有這一切，又均應以保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為前提。與蔣經國末年我方爭取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自上而下的統一相比，這無疑將是一條更艱難更漫長的道路，無疑需要非同尋常的耐心和長期艱苦的努力。

歸根結底，“關鍵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加快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順利實現中央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也是爭取台灣民心的根本條件。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當在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之後。在此之前，涉及兩岸關係的一切政策策略，應以確保黨的中心任務不受台灣問題重大干擾為第一，應以爭取島內民心為第一。鄧小平講過，不應因一時的形勢變化而動搖和平統一的決心。應以同樣的態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堅持江澤民提出的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進程的“八項主張”和胡錦濤提出的在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如此，可以使兩岸關係維持一種平和、穩定的氣氛，避免形勢出現大的波動，避免對我方中心工作造成重大的干擾。如此，亦可使我方從容深入開展爭取台灣民心的工作，為最終的統一逐步積累條件。

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指出，與對自然界的鬥爭不同，在社會鬥爭中，正確的認識、政策，不一定能立刻得以實現，而需待力量對比的轉化。當年，我方爭取蔣介石集團“率台灣整體來歸”的方針是正確的，蔣經國時期我方爭取經兩黨談判實現統一是正確的，但均因力量對比不足而未能實現。爾後形勢的變化，使我方改而實行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多年工作，已卓有成效。但條件遠未成熟，實現祖國的統一，仍然任重而道遠。

1949 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大陸的成就史無前例，中華民族的復興希望舉世公認。我們已經為統一奠定了基礎。只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央的方針，以堅此百忍的精神埋頭耕耘，不計收穫，則收穫自在人心。所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脯，天下歸心”。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大團結，偉大祖國和平統一，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而必將實現的。

註釋：

¹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